

目 錄

序 001

第一章 全球貿易戰和美國大蕭條 023

- 第一節 大蕭條時期貿易戰的時代背景和起因 024
- 第二節 演變：美國挑起關稅戰，各國施加報復性關稅 028
- 第三節 升溫和結局：從經濟危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 033
- 第四節 啟示：貿易保護主義導致「囚徒困境」，產生經濟、社會和軍事危機 042

第二章 美日貿易戰：日本為什麼金融戰敗？ 045

- 第一節 美日貿易戰發生的政治經濟環境 046
- 第二節 演變：六大行業貿易戰伴隨日本產業升級依次展開 059
- 第三節 升溫：二十世紀八〇年代中後期升級到金融戰、經濟戰 073
- 第四節 結局：日本貨幣寬鬆政策，金融戰敗，陷入「失去的二十年」 081
- 第五節 啟示：貿易戰背後是經濟爭霸和改革戰 093

第三章 美日貿易戰：美國如何贏得經濟爭霸？ 099

- 第一節 二十世紀七八〇年代美國面臨的挑戰：美蘇爭霸、日本崛起、國內經濟陷入停滯性通貨膨脹 100
- 第二節 雷根經濟學：減稅、放鬆管制、利率市場化改革 106
- 第三節 沃爾克控制通貨膨脹 111



- 第四節 美國贏得經濟爭霸，重新領導世界 114
- 第五節 啟示：供給側改革是應對內外部衝擊的最重要經驗 117

第四章 美蘇貿易戰：冷戰和全球爭霸 119

- 第一節 美蘇冷戰歷程 120
- 第二節 美蘇貿易戰的重點領域 136
- 第三節 啟示：蘇聯失敗的教訓，中美會走向「新冷戰」嗎？ 145

第五章 美國兩黨及總統內閣成員對華思想全景圖 151

- 第一節 美國權力的主要架構 152
- 第二節 美國貿易決策體制 158
- 第三節 川普總統內閣主要成員及其思想 161
- 第四節 美國政府及兩黨對華態度的轉變 168
- 第五節 美國對華態度轉變背後的關切點 176

第六章 中美歷次貿易摩擦及貿易失衡的根源 185

- 第一節 中美歷次貿易摩擦回顧與總結 187
- 第二節 中美貿易失衡的根源與對策 205

第七章 美國對華《301 報告》：主要內容及存在的問題 223

- 第一節 《301 報告》的主要內容 224
- 第二節 《301 報告》存在的四大問題 227

第八章 中美經濟、教育、文化、經商環境、民生現狀 249

- 第一節 中美經濟現狀 250
- 第二節 中美教育、文化、經商環境、民生現狀 279
- 第三節 中美宏觀稅負現狀 292

第九章 中美科技、新一代資訊技術現狀 305

- 第一節 中美科技比較：全球視角 307
- 第二節 中美新一代資訊技術現狀 313
- 第三節 美國科技體制的特點 333
- 第四節 中國科技體制改革及政策建議 347

結論 大國興衰的世紀性規律與中國復興面臨的挑戰及未來 351

- 第一節 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必將引發全球治理格局的洗牌 352
- 第二節 大國興衰的世紀性規律 354
- 第三節 中國經驗：中國做對了什麼？ 363
- 第四節 世界經濟重心轉移的趨勢及後果 365
- 第五節 中國經濟大國崛起的挑戰與未來 366

參考文獻 371



序

中美貿易摩擦的本質、影響、應對和未來沙盤推演

自二〇一八年七月六日中美貿易摩擦升級以來，美方對華加徵關稅的商品規模不斷擴大，並逐步升級至投資限制、技術封鎖、人才交流受阻、孤立中國等方面，對全球經濟與貿易、外商直接投資（FDI）、地緣政治、中美關係等產生深遠影響。截至二〇一九年五月初，中美已進行了十輪經貿高級別磋商，雙方圍繞協議文本開展談判，在技術轉讓、知識產權保護、非關稅壁壘、服務業、農業、匯率和執行機制等方面達成共識。

但二〇一九年五～六月，美國突然進一步提高關稅稅率和切斷華為供應鏈打壓中國高科技旗艦企業，中美貿易摩擦再次大幅升級。六月底中美元首會晤，同意重啟經貿磋商，中美貿易摩擦階段性緩和。我們認為，中美貿易談判存在波折和反覆，即使達成協議，也絕不意味著一勞永逸地解決了中美經貿摩擦問題。對此，中國要做好兩手準備。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美貿易摩擦具有長期性和日益嚴峻性。

隨著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級，美方的戰略意圖和底牌暴露得愈發明顯，其目標顯然不是縮減貿易逆差這麼簡單，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這是打著貿易保護主義的旗號，劍指中國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尤其是對中國高科技領域的戰略遏制。最能顯示美方戰略意圖的是兩份文件和兩個案例：二〇一八年三月的《301 報告》和二〇一八年五月的美方「要價清單」，二十世紀八〇年代的美日貿易戰以及當前美方對華為的圍堵。

隨著中國經濟發展、中美產業分工從互補走向競爭以及中美在價值觀、意識形態、國家治理上的差異愈發凸顯，美國政界對中國的看法發

生重大轉變，鷹派言論不斷抬頭，部份美方人士認為中國是政治上的威權主義、經濟上的國家資本主義、貿易上的重商主義、國際關係上的新擴張主義，是對美國領導的西方世界的全面挑戰。他們認為，中國經濟發展挑戰美國經濟霸權，中國進軍高科技挑戰美國高科技壟斷地位，中國重商主義挑戰美國貿易規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挑戰美國地緣政治，中國發展模式挑戰美國意識形態和西方文明。

中美貿易摩擦從狹義到廣義有四個層次：縮減貿易逆差、實現公平貿易的結構性改革、霸權國家對新興大國的戰略遏制、冷戰思維的意識形態對抗。縮減貿易逆差可以通過雙邊努力階段性緩解，但如果美方單方面要求中國做出調整，而不徹底改變自身高消費低儲蓄模式、對華高科技產品出口限制、美元的超發特權等根本性問題，美國的貿易逆差不可能從根本上削減，無非是類似當年美日貿易戰之後美國對外貿易逆差從日本轉移到中國，未來再從中國轉移到東南亞。在實現公平貿易的結構性改革方面，中國可以做出積極改革，這也是中國自身發展的需要。但是，這些都難以滿足美方戰略遏制中國高科技升級和大國復興的意圖。因此，中美雙方要管控分歧、避免誤判，多談判、合作、互信、尋求共贏，避免矛盾升級，中美雙方共同維護有利於增進人類福祉的全球化和市場化。

中美貿易摩擦使我們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在科技創新、高端製造、金融服務、大學教育、軍事實力等領域與美國的巨大差距；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在減少投資限制、降低關稅、保護產權、國企改革等領域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美關係從合作共贏走向競爭合作甚至戰略遏制；必須堅定不移地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保持戰略定力。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二〇一八年四月十日博鰲亞洲論壇二〇一八年年會開幕式講話中向世界宣告：「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實踐證明，過去 40 年中國經濟發展是在開放條件下取得的，未來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也必須在更加開放條件下進行。」

同時，我們也要清晰深刻地認識到中國經濟發展的巨大潛力和優勢，

新一輪改革開放將釋放巨大紅利，最好的投資機會就在中國：中國有全球最大的統一市場（近 14 億人口），有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體（4 億人群）；中國的城鎮化進程距離已開發國家仍有 20 個百分點的空間，潛力巨大；中國的勞動力資源近 9 億人，就業人員 7 億多，受過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的高素質人才有 1.7 億人，每年大學畢業生有 800 多萬人，人口紅利轉向人才紅利；新一輪改革開放將開啟新週期，釋放巨大活力。

在中美貿易摩擦初期，主流媒體和市場出現了嚴重誤判，「中美關係好也好不到哪兒去，壞也壞不到哪兒去」、「中美貿易摩擦對中國影響不大」等觀點流行。但是，我們在一開始就鮮明提出了一些與市場流行觀點不同、但被後續形勢演化所不斷驗證的判斷：「中美貿易摩擦具有長期性和日益嚴峻性」、「這是打著貿易保護主義旗號的遏制」、「中美貿易摩擦，我方最好的應對是以更大決心更大勇氣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堅定不移。對此，我們要保持清醒冷靜和戰略定力」。

美國真正的問題不是中國，而是自己，是如何解決民粹主義、過度消費模式、貧富差距太大、特里芬難題（Triffin dilemma）等。二十世紀八〇年代美國成功遏制日本崛起、維持經濟霸權的主要原因，不是美日貿易戰本身，而是雷根（Ronald Wilson Reagan）政府供給側改革和沃爾克（Paul Adolph Volcker）遏制通貨膨脹的成功。中國真正的問題是如何建設高水準的市場經濟和開放體制。

更深層次來看，過去 40 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受益於兩大清晰的立國戰略：對內改革開放，對外韜光養晦。今天的中國正處於戰略轉型期和戰略迷茫期，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是面對未來政治經濟社會形勢演化趨勢以及世界領導權更迭，確定一種對我有利的長遠戰略定位，類似當年英國的大陸均勢、美國的孤立主義和中國當年的韜光養晦。中國對內的立國戰略十分清晰，即繼續深化改革開放。對外方面，中國最重要的外交關係是中美關係，中美關係的本質是新興大國與在位霸權國家的關係模式問題，即選擇韜光養晦孤立、競爭對抗還是合作追隨。但是今天的中

美關係，跟過去英德、英美、美日、美蘇的關係不盡相同，既不是英德、美蘇那種你死我活的全面競爭對抗關係，也不是英美那種同種同源的合作追隨、順位接班關係，更多的是競爭合作關係。因此，中國需要在美國回歸到本國利益優先的霸權思維大背景下，樹立並宣揚一種對全世界人民具有廣泛吸引力的美好願景和先進文明；在美國回歸貿易保護主義的大背景下，以更加開放大氣的姿態走向世界；在美國四面開戰的大背景下，全面深入地建立與東南亞、歐洲、日韓、中亞等的自由貿易體系以實現合作共贏。歷史是有規律的，凡是不斷吸收外部文明成果、不斷學習進步的國家，就會不斷強大；凡是故步自封、阻礙時代潮流的國家，不管多強大，都必將走向衰敗。

我們十多年前從事「大國興衰的世紀性規律與中國崛起面臨的挑戰及未來」相關研究。自美國大選開始，我們便系統研究並持續跟蹤美國經濟社會發展背景、貿易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抬頭背後的經濟社會基礎、美國各界對華態度和戰略轉變、川普（Donald John Trump）新政主張及進展等。

只有深入研究大國興衰的世紀性規律、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抬頭的經濟社會背景、中美關係演變歷程和趨勢，清醒認識川普新政的核心訴求和底牌，才能避免戰略誤判，放棄幻想，著眼長遠，沉著應對。

一、二〇一八年以來，美對華從貿易摩擦向投資限制、技術封鎖、人才交流受阻等全面升級，中方同步反制並加快改革開放進程

（一）中美貿易摩擦演變

二〇一七年八月，美國總統川普指示美國貿易代表署（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對中國開展「301 調查」。二〇一八年三月，美國貿易代表署發佈了調查結果《301 報告》（Section 301 Report），指控中國存在強迫技術轉讓、竊取美國知識產權等問題，

川普據此對華加徵關稅。

自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一日起，美國收緊了科學、技術、工程、數學等專業中國留學生的簽證發放。這一趨勢逐漸蔓延並影響到了其他學科正常的學術交流，中國赴美交流學者多次被阻撓。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五日，美國單方面撕毀雙方在五月份達成的共識，擬對 500 億美元商品徵收 25% 關稅，分兩批實施。六月十五日，中國決定對原產於美國的約 500 億美元進口商品加徵 25% 的關稅。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八日，川普指示美國貿易代表確定擬加徵關稅的 2000 億美元的中國商品清單，稱如果中國採取報復性措施並拒絕改變貿易「不公平」做法，將額外徵收 10% 的關稅。六月二十七日，川普表示將限制中國投資美國關鍵科技產業。

二〇一八年七月六日，美國對 340 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 25% 進口關稅的措施落地。中國於同日對同等規模的美國產品加徵 25% 的進口關稅。

二〇一八年八月一日，川普威脅將對華 2000 億美元商品加徵關稅稅率從 10% 上調至 25%。八月三日，中方回應將對美 600 億美元商品分別加徵 5%、10%、20% 和 25% 的關稅。

二〇一八年八月八日，美國宣佈將於八月二十三日對華進口 500 億美元商品中剩餘的 160 億美元商品加徵關稅。中國宣佈八月二十三日對美 160 億美元商品加徵關稅。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八日，美國政府正式宣佈於九月二十四日起，對約 2000 億美元進口自中國的產品加徵 10% 的關稅，並將於二〇一九年一月一日起將關稅稅率提高至 25%。美國還稱如果中國針對美國農民或其他行業採取報復措施，將對約 2670 億美元的中國產品加徵關稅。中國商務部當日回應稱將同步反制。

二〇一八年十月一日，美加墨協定談判成功，設置毒藥丸條款，規定美加墨三國都不得「擅自」與「非市場經濟」國家簽署協定。這意味著在沒有美國許可的情況下，中國與加拿大和墨西哥兩國分別簽署自由

貿易協定的可能性將變得極為渺茫；更為嚴峻的是，美國若將該條款納入同歐盟和日本的貿易協定，中日韓自由貿易區（FTA）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談判也將受到重大影響。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一日，美國財政部外國投資委員會依據六月美國國會通過的《外國投資風險評估現代化法案》，正式加強對航空航太、生物醫藥、半導體等核心技術行業的外資投資審查，同時該法案還規定美國商務部部長每兩年向國會提交有關「中國企業實體對美直接投資」以及「國企對美交通行業投資」的報告。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日，美國商務部工業安全署（BIS）公佈擬制定的針對關鍵技術和相關產品的出口管制體系並對公眾徵詢意見，擬對生物技術、人工智慧（AI）和機器學習等 14 類核心前沿技術實施出口管制。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一日，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布宜諾斯艾利斯峰會上，中美兩國元首達成暫時休戰的框架性協議並開啟 90 天的結構性談判。

二〇一九年一月三十～三十一日，中美經貿磋商取得階段性進展，雙方同意採取有效措施推動中美貿易平衡化發展，中方將有力度地擴大自美農產品、能源、工業製成品和服務產品進口，但雙方在協議執行、知識產權保護和技術轉讓等結構性問題方面仍未達成一致。

與此同時，美方持續採用特殊歧視手段打擊華為。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九日，美國司法部宣佈對華為提出 23 項刑事訴訟，並將向加拿大提出引渡華為副董事長、首席財務官的請求，在全球打壓華為的行動持續升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五日，川普在國會發表年度國情咨文演講，以「選擇偉大」為主題，重申公平貿易原則、捍衛美國就業機會、奉行以美國利益為重的外交政策，以中國為經濟和價值觀的對手。「如果另一個國家對美國產品徵收不公平的關稅，我們可以對他們銷售給我們的同一產品徵收完全相同的關稅。」同日，美國貿易代表署發佈二〇一八年度《中

國履行加入世貿組織承諾情況報告》（*2017 Report to Congress On China's WTO Compliance*），提出中國依然存在強制技術轉讓、產業政策、非法出口限制、電子支付市場未對外資開放等問題，認為「中國對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和多邊貿易體系發起了獨特而嚴峻的挑戰，主要是因為未能接受開放的、以市場為導向的政策」。中國商務部隨即表示反對。

二〇一九年二月七日，美國白宮發佈未來工業發展計劃，提出將專注於人工智慧、先進製造、量子資訊和 5G 技術四項關鍵技術來推動美國經濟繁榮和保護國家安全。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四～十五日，第六輪中美經貿高級別磋商結束，雙方討論了技術轉讓、知識產權保護、非關稅壁壘、服務業、農業、貿易平衡、實施機制等議題，達成原則共識。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一～二十四日，第七輪中美經貿高級別磋商達成重要共識，雙方圍繞協議文本開展談判，增加了匯率和金融服務談判的內容，取得實質性進展。

二〇一九年三月一日，美國貿易代表署宣佈對二〇一八年九月起加徵關稅的自華進口商品，不提高加徵關稅稅率，繼續保持在 10%。中方表示歡迎。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八～二十九日、四月三～五日和四月三十日～五月一日，第八、第九和第十輪中美經貿高級別磋商繼續討論協議有關文本，持續取得進展。

二〇一九年五月六日，川普突然表示，將從五月十日起對中國原徵收 10% 關稅的 2000 億美元的進口商品加徵關稅至 25%，且短期內將對另外 3250 億美元商品徵收 25% 的關稅。五月十三日，中國宣佈六月一日起對美原加徵 5% 和 10% 關稅的 600 億美元商品提高稅率至 10%、20% 和 25%。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五日，美國總統川普簽署行政命令，宣佈美國進入「國家緊急狀態」，美國企業不得使用對國家安全構成風險的企業所

生產的電信設備。美國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局把華為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實體名單」。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大阪峰會上，中美兩國元首同意推進以協調、合作、穩定為基調的中美關係，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重啟經貿磋商。美方表示談判期間不再對中國產品加徵新的關稅。兩國經貿團隊將就具體問題進行討論。川普宣佈美國公司可繼續向華為公司供應不涉及國家安全的零組件。

（二）除針對中國外，美國發動了以自我利益為中心的全球性貿易摩擦，四面開戰、合縱連橫，遭遇了廣泛的反彈

二〇一八年三月，美國宣佈將對進口鋼鐵和鋁產品分別徵收 25% 和 10% 的關稅，涉及歐盟、加拿大、墨西哥、日本等多個國家和地區。作為反擊，歐盟宣佈將對價值約 35 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加徵 25% 的進口關稅。川普威脅稱將對進口自歐盟的汽車及零組件徵收 20% 的關稅。二〇一八年七月，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Jean-Claude Juncker）訪美，美國和歐盟發表聯合聲明，宣佈同意通過談判降低貿易壁壘、緩解貿易摩擦，並同意暫停加徵新關稅，美歐貿易摩擦緩和。但二〇一九年四月，川普指責歐盟非法補貼空中巴士公司（Airbus），因此要對價值 110 億美元的進口歐洲產品加徵關稅。二〇一九年七月一日，美國貿易代表署發佈了價值 40 億美元的擬徵收關稅的歐盟商品清單，美歐貿易摩擦再起。

川普多次指責美日貿易不公平，並對日本農業和汽車行業「開炮」。二〇一八年七月，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稱必須同日本協商貿易協定。九月，美日兩國啟動貨物貿易協定談判，美國農業部部長要求日本開放農業市場。十月，川普稱如果日本不開放市場，將對日本汽車徵收 20% 的關稅。美國政府甚至以美國對日本的安全保護為施壓籌碼，抨擊《美日安保條約》不公平。

美國試圖建立一個繞過 WTO 的新的世界貿易體系。除美歐、美日

談判外，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七日，歐盟和日本在東京簽署《經濟夥伴關係協定》（EPA），如果美日歐結盟，WTO 將名存實亡，世界將形成兩大平行市場，國際經貿秩序面臨重建。但是，美歐、美日聯盟的建立並非一蹴而就，仍存在很多問題，如歐洲和日本的農業、汽車短期內難以實現與美零關稅（尤其法國農業將受到較大衝擊），隨後美歐聯合聲明遭到了法國等國家的強烈反對。

美國對其貿易逆差第二大來源國墨西哥發起貿易摩擦。川普上任伊始就提出要重新談判美加墨自由貿易協定。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川普將外交問題經濟化、將關稅武器化，為限制非法移民，稱從六月十日起對進口自墨西哥的所有商品加徵 5% 的關稅；如果危機未能解決，美國將不晚於十月一日繼續上調關稅稅率至 25%，墨西哥不得不部署國民警衛隊加強邊境執法並接收非法移民遣返至墨西哥境內。

美國還發起了對印度的貿易摩擦。二〇一九年六月五日，美國終止了印度的普惠制貿易地位，取消對印度的關稅減免優惠，印度隨即對蘋果、杏仁等 28 種美國產品加徵報復性關稅。

（三）中方以打促和，擴大改革開放

中國一方面對美加徵關稅予以回擊，促使美國回到談判桌上；另一方面就降低關稅、促進投資便利化、擴大開放、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積極推動改革開放事業。

二〇一八年四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年會講話中提出，降低汽車進口關稅和外資股權比例限制，加大金融服務業開放等。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國下調亞太進口協定稅率，實行黃豆進口零關稅。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中國發佈了《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二〇一八年版），共在 22 個領域推出開放措施，基本完全放開製造業的投資限制，並提出二〇二一年將取消金融領域所有外資股比限制。二

○一九九年七月二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第十三屆夏季達沃斯論壇（Davos Forum）上表示該領域開放將提前至二〇二〇年。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六日，第二十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雙方表示致力於在雙邊貿易和投資領域確保公平互利合作，加快《中歐投資協定》談判。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五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第一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上宣佈五大主動新開放舉措：激發進口潛力、持續放寬市場准入、營造國際一流經商環境、打造對外開放新高地、推動多邊和雙邊合作深入發展（中日韓自貿區）。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九～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推動全方位對外開放。推動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等制度型開放轉變。要放寬市場准入，全面實施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保護外商在華合法權益特別是知識產權，允許更多領域實行獨資經營。要擴大進出口貿易，推動出口市場多元化，削減進口環節制度性成本等」。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五日，中國人大通過《外商投資法》，對外商投資的准入、促進、保護、管理等做出了統一規定。三月二十八日，李克強在博鰲亞洲論壇二〇一九年年會開幕式上宣佈加快制定《外商投資法》的配套法規，擴大增值電信、醫療機構、教育服務、交通運輸、基礎設施、能源資源等領域對外開放。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宣佈中國將採取一系列重大改革開放舉措，加強制度性、結構性安排，促進更高水準對外開放，包括更廣領域擴大外資市場准入、更大力度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國際合作、更大規模增加商品和服務進口、更加有效實施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更加重視對外開放政策貫徹落實。中國將繼續大幅縮減負面清單，推動現代服務業、製造業、農業全方位對外開放。這與川普的「美國優先」形成鮮明對比。

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國商務部稱將建立「不可靠實體清單」

制度，不遵守市場規則、背離契約精神、出於非商業目的對中國企業實施封鎖或斷供，嚴重損害中國企業正當權益的外國企業、組織或個人，將被列入「不可靠實體清單」。

二〇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商務部公佈了《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二〇一九年版），與二〇一八年版相比，二〇一九年版的負面清單進一步放寬了採礦業、交通運輸、基礎設施、文化等領域的投資限制，負面清單條目由 48 條減至 40 條。

二、近年來美國政界對中國看法發生了重大轉變，美國兩黨對華政策形成共識，總統內閣成員已基本換成對華鷹派

1. 川普總統內閣（President's Cabinet）成員已基本換成對華鷹派。自二〇一七年一月就任總統至二〇一九年一月，川普頻繁更換總統內閣、白宮高層人員已達 42 人，就任第一年白宮官員變動率達 34%，遠高於奧巴馬（Barack Obama）、小布希（George Walker Bush）、柯林頓（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同期的 9%、6% 和 11%。當前，與外貿及經濟直接相關的主要高層已基本轉為鷹派，與其他內政、外交相關的副總統邁克·彭斯（Mike Pence）、國務卿邁克·蓬佩奧（Mike Pompeo）等則多次指責中國的南海、「一帶一路」倡議等問題，對華批評從貿易上升到意識形態層面，是極端鷹派。貿易代表萊特希澤主張在貿易上保持對中國的強硬姿態，認為中國是對全球貿易體系最大的破壞者。貿易和製造業辦公室主任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認為中國利用貿易補貼和匯率操縱，將產品傾銷到美國。白宮首席經濟顧問拉里·庫德洛（Larry Kudlow）對華態度由鴿轉鷹，認為「301 調查」的核心是科技問題，不能讓中國扼殺美國的未來。商務部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認為美國首要任務是縮減貿易逆差，對實行不公平貿易政策的國家予以反擊。

2. 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至今，中美關係可劃分為三個階段：合作共

贏（一九七九～二〇〇〇年）、競爭合作（二〇〇一～二〇〇八年）、戰略遏制（二〇〇八年至今），兩黨對華態度同時經歷了三個階段：從對華友好的共識到分歧，再到形成遏制中國的共識。共和黨更為務實，重實際利益輕意識形態，民主黨重意識形態，強調中國的人權問題，共和黨對華負面評價佔比高於民主黨。

3.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六日，美國前副國務卿、世界銀行前行長佐利克（Robert Bruce Zoellick）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專題研討會上的演講較具代表性。

「美國對中國的擔憂不只侷限於川普政府。假設中美關係在國會期中選舉，或者是二〇二〇年總統大選之後回到過去是不太現實的。我主要有四個方面的擔憂：

「第一，國企的作用。在外界看來，中國好像轉向了國家資本主義的模式，我們擔心中國私營企業沒辦法公平競爭。

「第二，我在過去 10 年觀察到的美國和其他國家以前非常支持和中國的友好關係，現在變得越來越沮喪。因為他們面臨強制的技術轉讓，可能會有監管方面對競爭的限制，以及對知識產權的竊取等。以前的商界是非常支持發展友好中美關係的，現在他們已經不再扮演這個角色了。

「第三，『中國製造 2025』。對某些人來說，這看起來好像是要在未來統治科技行業。和外國人溝通的時候，有的時候他們會覺得這是非常可怕的，因為這是基於保護主義、補貼以及對海外科技企業的收購。

「第四，中國的外交政策，從以前鄧小平時代的自我克制轉向現在這種非常自信的大國外交。中國加入 WTO 時的那些衣服現在已經不太合身了。中國在市場准入方面做出了很多承諾，可能比其他開發中國家做出了更多的承諾。但是，現在中國的平均關稅還是 9% 左右，是其他國家的 3 倍。像我這樣的人就很難向川普總統去解釋為什麼中國對美國的汽車進口關稅是 25%，而美國對中國汽車的進口關稅是 2.5%。

「我們看整體的投資和貿易情況，雙方的條件確實不是對等的。所

以，在美國造成了一種不公平的看法。川普政府認為美國在過去 70 年對中國和其他國家讓步太多了。我想對於這種不公平待遇的認識會增加對中美關係的壓力。」

4.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七日，美國前財政部部長保爾森（Hank Paulson）在新加坡舉辦的彭博創新經濟論壇發言中指出：「美國兩黨雖然在其他所有問題上看法都不一致，但對中國的負面看法高度一致。對華貿易損害了部份美國工人的利益，他們已經通過選票表達了不滿。一個正在形成的共識是，中國不但對美國是個戰略挑戰，同時中國的崛起已經損害美國利益。美國人越來越相信中國是一個同一級別的競爭者，在推行有敵意的政策，並對美國構成戰略挑戰。」「越來越多的人轉向懷疑甚至反對過去的美國對華政策。美國企業不希望發生貿易摩擦，但它們確實希望政府採取更積極的態度。窒息競爭的政策，以及近二十年來緩慢的市場開放步伐使美國商界感到沮喪。它讓我們的政治人士和專家的態度加速轉向負面。」

5. 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Henry Alfred Kissinger）表示，「中美關係再也回不到過去了，需要重新定義」。

6. 中國美國商會主席威廉·蔡瑞德（William Zarit）認為美國商界對中美經貿關係已經由支持態度轉向懷疑態度，由於中國加入 WTO 後開放持續放緩，導致了大量不公平貿易的存在。

三、川普競選總統逆襲、美國貿易保護主義以及民粹主義盛行，並非偶然現象，而是具有深層次的經濟社會背景

1. 二〇〇八年次貸危機以來，量化寬鬆（QE）和零利率導致資產價格大漲，美國收入分配差距空前拉大，製造業大幅衰落，底層沉默的大多數被剝奪感加深。國際貿易的基本理論指出，各國勞動生產率、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差異決定了國際分工，分工提升了專業化生產、規模經

濟效應和生產率。因此，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可以從國際貿易中受益。但是，國際貿易具有極強的收入分配效應，貿易所得對出口部門有利，但將使得進口部門受損。美國在國際貿易中整體受益，支撐了高消費模式，美國的科技和金融具有比較優勢並因此受益，但不具備比較優勢的製造業（中低端）受損。

我們認為，一定要把美國政客和企業家分開，政客欺騙的是部份在全球化進程中受損的底層民眾，大部份知識菁英、企業家和民眾是清醒、友好和理性的。在美國存在一大批支持全球化和改善中美關係的建設性重要力量。受益於全球化的美國金融和科技企業反對川普的貿易保護主義，同時希望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市場准入等方面改進。美國鐵鏽州的傳統失業工人是支持川普對華強硬的主要政治基礎，部份政客的貿易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主要迎合了這部份選民。

2. 美國貨物貿易逆差創歷史新高，促使美國政府、企業和民眾全面反思過去長期支持並主導的全球化對美國的負面影響以及美國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問題。在美國的巨額貿易逆差中，對中國的貨物貿易逆差佔比 48%，與二十世紀六〇年代西歐、八〇年代日本類似，當前的中國成為美國轉移國內矛盾的重要對象。美方認為，中美貿易失衡和美國製造業衰落的主要責任在於中方的重商主義，希望系統解決造成貿易逆差的深層次體制機制和結構性問題。二〇一八年六月二～三日備受市場期待的中美經貿談判無果而終，美國商務部部長羅斯在北京談判時不僅提出削減貿易赤字，還聚焦於促使中國改變有爭議的貿易和產業政策，「這不僅關乎（中國）購買更多（美國）商品，還關乎結構性變化」。

3. 一方面，改革開放 40 年的成就、中國共產黨的十九大報告展示了中國經濟的勃勃生機和宏偉藍圖，二〇一二～二〇一八年中國佔全球經濟規模比重從 11% 上升到 16%，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另一方面，二〇〇八年以來，美國受金融危機重創、貧富差距拉大，反全球化抬頭，當前中美貿易摩擦加劇實質是新冷戰思維，引發在位霸權國家遏

制新興大國崛起。在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就大力推行一體兩翼、兩翼張開（TPP、TTIP）的經濟戰略以及「戰略東移」的軍事戰略，試圖重返亞太，實施「亞太再平衡」。二〇〇八年美國《國防戰略報告》（*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將中國定位為「潛在競爭者」，隨後爆發次貸危機，美國忙於應對國內經濟；隨著美國經濟復甦以及中國日益崛起，二〇一八年《國防戰略報告》將中國首次定位為「戰略性競爭對手」。此次中美貿易摩擦不過是過去十多年美方遏制中國發展戰略的延續和升級而已。

4. 當前的中美貿易摩擦形勢不同於過去 40 年，從根本性質、深層次原因上更類似美日貿易戰。美日貿易戰從二十世紀五〇年代中後期一直打到二十世紀八〇年代末九〇年代初，歷時 30 餘年，先後涉及了紡織品行業（一九五七～一九七四年）、鋼鐵行業（一九六八～一九九二年）、彩電行業（一九六八～一九八〇年）、汽車行業（一九八一～一九九五年）、通信行業（一九八一～一九九五年）和半導體行業（一九七八～一九九六年）。日本從早期的「自願限制出口」（如紡織、鋼鐵、家電）到不得不接受自願擴大進口、取消國內關稅（如汽車行業）、開放國內市場（如電信行業）、對出口美國的產品進行價格管制（如半導體產品）等條件，日本汽車公司甚至選擇直接赴美投資，以不斷滿足美國花樣百出的訴求。但是美日貿易戰並未解決雙方貿易失衡的根本性問題。

除了貿易戰之外，美國還對日本挑起了匯率金融戰和經濟戰等。一九八五年，在美國的主導和強制下，美、日、德、法、英等簽署了《廣場協議》（*Plaza Accord*），日元兌美元在短時間內大幅度升值；一九九〇年，美國與日本簽訂了《美日結構性障礙問題協議》（*The U.S. Japan Structural Impediments Initiative*），要求日本開放部份國內市場，並直接強制日本修改國內經濟政策和方針，之後日本政府通過舉債的方式進行了大量的公共投資。

《廣場協議》後，日元升值導致日本貿易順差減少，經濟增速和通貨膨脹水準雙雙下行，為應對「日元升值蕭條」，日本銀行開始不斷放

鬆銀根。寬鬆的貨幣政策使得國內過剩資金劇增，為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提供大量的流動性資金，進而推動了投機熱潮的高漲，最終導致平成泡沫的破裂。

在長期的美日貿易戰中，美國步步緊逼，日本節節退讓甚至無原則順從，直到應對失當、國內資產價格泡沫崩盤，日本從此陷入了「失去的二十年」，再也沒有能力和資格挑戰美國經濟霸權，美日貿易戰才以日本金融戰敗宣告結束。

四、川普政府在中美貿易摩擦中的訴求和底牌

1. 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作為川普競選班子的宣傳總長和核心智囊，其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在日本東京的演講《中國摘走了自由市場的花朵，卻讓美國走向了衰敗》，已經清晰地傳遞了川普政府的理念以及對中國的態度：

「這次民粹主義的大規模興起發生在一個獨特的全球階段，就是中國的崛起。美國的菁英們長期錯誤地期望中國會實行自由市場經濟。而今我們看到的卻是儒家重商主義模式。

「因為中國出口過剩使得英國中部和美國中西部的工業地區被掏空。美國的勞動階層和底層人民的生活水準在過去幾十年出現了倒退。

「川普將如何做呢？第一，他將阻止大量的非法移民進入美國。第二，他將把產業工作重新帶回美國。第三，他將要重新審視美國已經陷入十六七年的國外戰場，如果我們把 5.6 兆美元軍事費用花在發展我們的城鎮和基礎設施上，我們與中國國際經濟的競爭應該已經遠遠領先。

「川普總統的中心目標是重振美國，其中的重要策略是對中國的貨幣操縱、不公平貿易加以反制。中國摘走了自由市場的花朵，那就是我們的創新。」

2. 現任貿易代表萊特希澤的《對美中貿易問題的證詞》、《中國貿

易壁壘清單》，展示了美方鷹派對中國貿易問題的認識、反思和訴求。

羅伯特·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曾在雷根政府時期擔任美國副貿易代表，二十世紀八〇年代的美日貿易戰就是他的傑作。他對自由貿易持懷疑態度，主張對違反貿易規則的國家徵收高額關稅。二〇一八年五月四日美方提出的「要價清單」，大部份反映了萊特希澤的建議。

萊特希澤在二〇一〇年《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證詞：對過去十年中國在 WTO 中作用的評估》中指出：十年來，中國加入 WTO 的承諾大部份沒有兌現，美國批准給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PNTR）是錯誤的：（1）美國的政策制定者沒有意識到，中國的經濟政治體制與我們的 WTO 理念之間多麼格格不入；（2）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嚴重誤判了西方企業將其業務轉向中國並以此服務美國市場的動機；（3）美國政府對中國重商主義的反應十分消極。

萊特希澤還認為，中國沒有履行加入 WTO 的承諾：（1）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的支持者承諾的經濟利益未能實現。從二〇〇〇年到二〇〇九年，美國對華貿易赤字增長了兩倍，美國製造業也失去了幾百萬就業崗位。（2）中國的法制承諾很值得懷疑，美國政府仍在就中國不尊重美國的知識產權表達重大關切。（3）中國重商主義對美國經濟產生了致命影響。

3. 川普在競選期間的政策主張和班農傳遞的民粹主義理念基本一致。大選期間川普的政策主張是貿易保護主義、民粹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混合體。勝選後川普開始明確其政策框架核心細節並著手實施，比如簽署稅改法案、收緊移民政策、對中日歐全面發起貿易摩擦、推動基礎建設落地等。

4. 《301 報告》和二〇一八年五月美方的《平衡美利堅合眾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貿易關係》（*Balancing the Trad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即美方「要價清單」）清晰地反映了美方意圖。

《301 報告》對中國提出五項指控，包括不公平的技術轉讓制度、

歧視性許可限制、政府指使企業境外投資以獲取美國知識產權和先進技術、未經授權侵入美國商業計算機網路及其他可能與技術轉讓和知識產權領域相關的內容。但是，《301 報告》存在大量的數據誤導性引用、片面陳述、雙重標準和混淆概念等問題。美方沒有看到中國自加入 WTO 以來在降低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擴大對外開放領域、放鬆股權限制、保護知識產權等方面做出的努力和進步。

美方「要價清單」包括：中方削減 2000 億美元對美貿易順差；停止對「中國製造 2025」的補貼和支持；保護知識產權；降低關稅；擴大農產品進口；改進美方在中國的投資限制。其中，「中國製造 2025」被三次提及。

當前中國對美貿易順差較大的領域主要是機電、影音製品、勞動密集型的紡織品等中低端製造，但是美方開出的要價清單及對中國加徵關稅的領域並不是上述中低端製造，而是未來要大力發展的高科技產業。這是打著貿易保護主義旗號的赤裸裸的遏制，展現了川普政府的單邊主義、霸權主義和美國利益優先思維。總之，上述兩份文件清晰地反映了美方意圖，即害怕中國取得先進技術趕上並威脅美國的競爭優勢和「國家安全」，擔憂中國政府大範圍、深度介入高科技創新的制度和行為，因此要打壓並遏制中國高科技。

5. 川普政府四面開戰，在外部提高關稅，在內部大幅減稅，這兩大措施既提高了全球出口到美國的成本，也降低了在美國生產的成本，其目的在於吸引資本回流和「再製造化」，進而實現「讓美國再強大」。

五、未來沙盤推演

1. 短期看，中美貿易摩擦打打停停，只會緩和不會結束。

中美貿易摩擦將繼續以「升級—接觸試探—再升級—再接觸試探」的邏輯演化，邊打邊談，打是為了在談判桌上要個好價錢，鬥而不破，

甚至可能達成關於結構性改革和削減貿易逆差的協議。但是涉及中方核心利益的發展高科技和產業升級將難以滿足美方要求，貿易摩擦只會緩和不會結束。即使達成協議，也並不意味著一勞永逸，川普仍有可能撕毀協議。

2. 未來半年到一年，決定中美經貿關係走向有四個重要變量和關鍵節點。

(1) 二〇二〇年總統大選，將在二〇一九年下半年啟動，對華強硬的貿易政策可能再度成為候選人贏取選票的策略，對華強硬的貿易政策大機率延續，「中國威脅論」等論調可能再次甚囂塵上。

(2) 美國經濟見頂回落和美股回調的速度，若中美貿易摩擦再度加劇，美國經濟和股市將面臨下行，將制約川普的強硬態度。

(3) 中國改革開放的力度，中方持續改革開放，放寬市場准入、強化知識產權保護、改革國企等，既符合自身需要，也釋放談判誠意。

(4) 美國引發其他國際爭端牽制中國，美方可能借助朝鮮、伊朗、南海、台灣等問題牽制中國。

3. 長期看，中美貿易摩擦具有長期性和日益嚴峻性。

美國已積累起貿易戰（對華摩擦的五大方面）、匯率金融戰（對日本）、資源戰（對歐洲）的多維打擊經驗。展現在我們面前的不僅是中美貿易摩擦，還是經濟、政治、文化、科技、網路、意識形態等領域的全方位綜合實力較量。

(1) 《廣場協議》簽訂前，日美兩國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之比接近 40%；二〇一八年中國 GDP 相當於美國的 66%。按照 6% 左右的 GDP 增速，預計在二〇二七年前後，中國有望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一個有近 14 億人口的超大型經濟體從起飛、轉型到跨越，這將是人類經濟增長史上的奇蹟。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的競爭對手；與二十世紀八〇年代的日本不同，中國不會拿核心利益做交換。

(2) 從全球新經濟的獨角獸企業來看，美國和中國企業佔比超七成，展現了中國新經濟的勃勃生機。據 CB Insight 數據，截至二〇一八年年底，全球共有 311 家獨角獸，其中來自美國的共 151 家，佔 48.6%；中國緊隨其後，共 88 家，佔 28.3%；英國和印度分別位於第三和第四位，分別有 15 家和 14 家，佔 4.8% 和 4.5%。

(3) 中國研發支出佔 GDP 比重與美國的差距在縮小。中國工程師人數逐步上升，理工科畢業生逐年增加，中國從人口數量紅利轉向工程師紅利。

(4) 中國製造業快速崛起，增加值佔全球製造業增加值總額比重持續上升，並進軍高科技，中美產業互補性逐步削弱、競爭性逐步增強。

(5) 從世界大國興衰的世紀性規律和領導權更迭來看，貿易摩擦是中國發展到現階段必然出現的現象和必將面臨的挑戰。要深刻認識到此次中美貿易摩擦是由於發展模式、意識形態、文化文明、價值觀等差異所引發的世界領導權更迭之爭。其未來演化的參考模式不是過去四十年中美貿易摩擦的模式，而應參考英美世界領導權更迭、美日貿易戰等的歷史演化模式。

六、應對中美貿易摩擦最好的方式是更大決心和更大力度地推動改革開放

1. 當前市場上流行三類觀點：投降論、強硬論和開放論。

面對中美貿易摩擦持續升級，有一種悲觀的「投降論」觀點開始流行起來，認為只要中國服軟，中美貿易摩擦即宣告結束。

第二種流行觀點是「強硬論」。在此次中美貿易摩擦之前，中國國內存在一些過度膨脹和過度自信的思潮。隨著中美貿易摩擦升級，有種思潮是引向狹隘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甚至民粹主義，認為中國已經強大起來，有實力在經濟、金融、資源、輿論、地緣政治等領域對美方全面開戰。

中美貿易摩擦折射出中國在改革開放領域仍有很多功課要做，從這個意義上，此次中美貿易摩擦未必是壞事，中國可以轉危為機，化壓力為動力。坦率講，在降低關稅、放開投資限制、打破國企壟斷、更大力度地推動改革開放、建立更高水準的市場經濟和開放體制等方面中國有很多的功課要去做，這是我們客觀要承認的。

我們認為，無論是「投降論」還是「強硬論」，都是被美方牽著走，中國應保持歷史的大局觀和清醒的戰略定力，把主要精力放在做好自己的事情上，加大改革開放力度，建設高水準市場經濟和開放體制，建設自由平等、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我們的世界觀和意識形態自然會得到世界的認同，歷史和人民最終會給出最公平的答案。

2. 我們建議中方擺脫被動接招應對，主動提出與美方積極推動建立基於「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的中美自貿區。

自由貿易有利於促進國際分工、發揮中美兩國各自的要素稟賦優勢、實現雙贏，而且自由貿易天然有利於製造業大國，這在歐元區、各自自貿區以及全球化進程中均表現明顯，中國是過去 40 年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德國是歐盟的最大受益者。從理論上也成立，中國勞動要素成本整體低於美國而且製造業產業鏈更完整，中美自貿區能夠實現雙贏，同時也是中國自身發展及進一步對外開放的需要。因此，建立中美自貿區將有助於化解中美貿易摩擦，化干戈為玉帛。繼中國二十世紀八〇年代設立特區、二〇〇一年加入 WTO 之後，建立中美自貿區將開啟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高潮，助力中國從製造業大國走向製造業強國。同時，中方應該高調宣傳與美方共建自貿區的意願，讓美方回到談判軌道上，美方也應該受規則制約。此外，中國還應積極聯合東盟、拉丁美洲、非洲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與歐盟、日韓積極開展雙邊合作和自貿區談判，尋求 WTO 等國際協調機制，避免貿易摩擦升級擴大。

3. 貿易戰的本質是改革戰，最好的應對是順勢以更大決心更大勇氣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

前期金融去槓桿和中美貿易摩擦引發貨幣再度寬鬆的呼聲和討論，這是非常短視和誤國的，如果面對中美貿易摩擦的外部衝擊而重回寬鬆的貨幣政策，將重演美日貿易戰的失敗教訓。中美貿易摩擦應往改革開放的共識引導，類似一九六〇～一九九〇年德國產業升級的應對模式。信心比黃金更重要，未來應以六大改革為突破口，提振企業和居民信心，開啟高質量發展新時代。

第一，建立高質量發展的考核體系，鼓勵地方試點，調動地方在新一輪改革開放中的積極性。

第二，堅定國企改革，避免陷入意識形態爭論，要以黑貓白貓的實用主義標準衡量。

第三，大力度、大規模地放活服務業，調動民營企業家積極性。

中國已經進入到以服務業為主導產業的時代，製造業升級需要生產性服務業大發展，滿足美好生活需要消費性服務業大發展。中國共產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份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中國製造業除了汽車等少數領域，大部份已經對民企外企開放，但是服務業領域仍存在嚴重的國企壟斷和開放不足，導致效率低下，基礎性成本高昂。未來應通過體制機制的完善，放開國內行業管制和要素市場化、降低部份服務業非關稅壁壘，更大程度地放活服務業。

第四，大規模地降低微觀主體的成本。推動減稅、簡政，降低物流、土地、能源等基礎性成本。

第五，防範化解重大風險，促進金融回歸本源，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

第六，按照「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建立居住導向的新住房制度和長效機制，關鍵是貨幣金融穩健和人地掛鉤。未來應推行新增常住人口與土地供應掛鉤；保持房地產金融政策長期穩定；從開發商為主轉變為政府、開發商、租賃中介公司、長租公司等多方供給；推進房地產稅改革，抑制投機型需求。

第一章 全球貿易戰和美國大蕭條*

一九二九年大蕭條初期，美國股市泡沫破裂，銀行業危機爆發，經濟陷入蕭條。為保護本國經濟和就業，美國全面提高關稅，隨後引發各國競相採取報復性措施，包括提高關稅、施加進口配額限制、投資限制以及匯率貶值，導致國際貿易狀況嚴重惡化，國際協調機制崩潰，各國經濟雪上加霜。最終金融危機全面失控，不斷升級至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政治危機乃至軍事危機，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人類進入自我毀滅模式。教訓慘痛，殷鑑不遠。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社會吸取教訓，逐步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世界銀行（World Bank）等國際協調機制和組織，世界經濟進入較為繁榮穩定的發展時期。二〇一八年美國再度引發全球貿易摩擦，川普政府應吸取歷史教訓，勿重蹈大蕭條覆轍。

*本章作者：任澤平、羅志恆、賀晨。